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责任编辑:吴南瑶

每年“五一”，是我这个食肉者一年中仅有的两周食蔬季开始之日，因为本地蚕豆上市了。上海最著名的本地蚕豆是嘉定三白和浦东小绿。其中我喜好浦东小绿。新鲜本地蚕豆最是娇嫩。需要被精心呵护，刚买来的蚕豆要马上平摊开，窝在一起存放会让蚕豆变馊。最好上午菜场买新鲜的，中午就吃，

欲罢不能的蚕豆

俞挺

剪去豆荚的头，然后将豆子挤入碗中，不洗，直接下锅。时令蚕豆只需清炒，热锅爆香小葱后，翻炒蚕豆，讲究的人不加水，不盖锅盖，全神贯注地中火翻炒，不可生不可焦。不过按照我的经验，少量水，加盖焖焖其量也可，但不可离开灶头，稍微过头，蚕豆就会失去那抹艳丽的绿色。我家炒蚕豆，喜

欢加一些糖，一来提鲜，二来压一压豆壳的苦涩。蚕豆最怕店家勾芡，二八年华的少女哪需要涂脂抹粉？那黏糊糊的芡粉分明玷污了蚕豆的清新，反而显得粗俗市侩。

一碗碧绿生青的蚕豆要趁热吃，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要及时抓住，微烫的豆壳会轻轻触痛嘴唇，微痛的嘴唇将豆仁从豆壳中挤出来，用牙齿轻轻咬断这娇嫩的豆仁，同时褪出豆壳，只留

下豆壳那轻微苦涩的味道伴随着清香糯嫩的豆仁，那是满嘴的初夏味道，几乎是记忆中青年人有些笨拙但青春的告白。有时豆壳是如此之嫩，以至于舍不得将其放弃，转而连着脆嫩的豆仁被吃掉。蚕豆是一个人的食物，需要你全神贯注地对待她，走神，或者拖延，都会失去那短暂的美丽。一个人吃蚕豆，就像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爱情，期间只有醇厚的白酒可以陪伴。

我非常珍惜蚕豆这短短两周的鲜嫩时光，天天食用也不会吃厌。两周过后的蚕豆就变老了，尽管我知道有各种吃法，比如加入夜开花焗煮，剥出豆板炒咸菜，或者盖上湿布制成发芽豆炒咸菜等等。即便制成豆瓣酥、豆瓣酱或者闻名全国的奶油五香豆，抑或油炸成佐黄酒的兰花豆，都再也无法取悦我。那些复杂得多的制作



智慧餐 郑辛遥 某些古董童的三步曲：被人骗——自骗自——骗别人。

是试图挽留蚕豆的韶华，但又如何比得上当季乃发的蚕豆的无敌青春？

这几年，日本豆被本地农户大量引种，日本豆抗病性较强、适应性较广，产量是本地品种的三倍，适宜于速冻加工出口，所以经济效益较高，受本地农户欢迎。但日本豆在吃口上远逊于本地蚕豆。要分辨两者也很容易，上海本地豆一个豆荚两颗豆，日本豆一个豆荚三颗。我们总是这样，曾经被数量迷惑过而放弃了质量，等过了一阵子，才发现数量无法变成质量。等明白过来，会发现质量的东西却很难再找回来了。

翠绿的蚕豆季来得并不引人注目，去得也自然，食客们从不会用狂欢去透支她，也不会撕心裂肺地挽留她，轻松但认真地享受这短暂欢愉的当下，便足够了。

超市里多为立式多层货架，常见有人在货架前不停地翻找，尤以保质期较短的食品为甚。原以为是这些顾客过于挑剔，后来发现并非完全如此。有些超市爱将早期生产的货品放在外层，而将近期生产的放在里层，这就难怪顾客要从中到外翻个遍了。

显而易见，超市方是怕过期货物卖不出去造成经济损失，但实际效果适得其反。将新鲜的货物藏着掖着，容易使顾客产生对超市的不信任，选购时常备戒心，即便不是入口的食品，也一概会东寻西找个兜底翻，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翻遍货架并仔细比较，顾客浪费了购物的时间与精力，超市也加重了理货负担和人力成本。而顾客反复翻找后，不同生产日期的货品混在了一起，造成过期货品不易及时察觉，损害了顾客的利益不说，也会给超市的声誉和经济造成损失。

这是一件小事，但透射出的社会现实却引人深思。日前读到一篇介绍澳大利亚关于超市理货的文章，说那里货架上的物品，摆在最外层，最明显，最容易取到的，永远是最近生产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大气的态度。当你坦诚面对消费者、树立起诚信的形象，消费者也必然会对你更加信任，从而提高你的效益；而遮遮掩掩的“小伎俩”，反而会破坏最基本的信任，因小失大。我们常说要建立社会的诚信体系，诚信是双向的，个人提高自己的素养固然重要，但企业、单位、机构等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同样不可忽视。予人诚信，才能挽回诚信。

刚过去的5月15日是芭蕾配乐《普尔钦奈拉》首演95周年的纪念日，创作这部作品的作曲家是被誉为“先锋派音乐引领者”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这位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堡（今罗蒙诺索夫），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作曲家。

在1910-1913年间，斯特拉文斯基所创作的芭蕾舞三部曲：《火鸟》《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无疑证明了其成就，首演于1913年的《春之祭》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部作品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意义，绝不亚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对于19世纪的冲击，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全世界的作曲都在模仿斯特拉文斯基新颖的节奏型、音响效果和创作形式。

虽然作曲家之后创作的作品再也没有像上述三部作品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是斯特拉文斯基始终不断尝试新的音乐类型，他引领着西方音乐进入了新古典时期，他那使用了非常抽象概念的音乐被认为是世界性的。

倾听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乐趣在于能够分享他那极有条理的思想发展历程，因此

培养元气 那秋生

元气为生命之本，心安自得而培养元气。安静通气，大脑安静使全身肌肉容易放松，气血畅通，达到“心静神安、老而不衰”的境界。心平气和，可平衡阴阳，调和六脉，祛病延年。宽胃养气，如果饮食无节，烟酒无度，会使胃气不足，气血虚衰。长啸舒气，饭后茶余，闲庭信步，或低吟自己喜欢的诗词，或哼唱小调，可舒畅心情，排除杂念，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现代主义’，斥责为‘忘本’——丢掉了‘真正的俄罗斯传统’。

普尔钦奈拉是早期意大利那不勒斯喜剧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热心而机智。由于城里的姑娘都是喜爱普尔钦奈拉，男青年们都嫉妒他。男青年们计划杀害普尔钦奈拉，但是未能成功。普尔钦奈拉假装死去，男青年们高兴地换上普尔切奈拉的衣服，向各自心爱的姑娘求婚，普尔钦奈拉非但没有报复，反而借助魔法师的长袍协助他们双双成亲，然后自己也娶了心爱的姑娘萍皮涅拉。

斯特拉文斯基将全剧分为8场、20段音乐，采用了特别适合室内乐队的33件乐器的编制，声乐部分使用了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低音。

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能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模式实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改编几个世纪前的音乐并获得成功。当时随着新古典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意识到了《普尔钦奈拉》的价值。其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这部作品的一个总结：“如今，我们几乎把这部被幽默的节奏和带有刺激性的配器改造的18世纪意大利风格的作品，与毕加索向古典绘画的回归同等看待。”

斯特拉文斯基的《普尔钦奈拉》

王世逸

并不像贝多芬、舒伯特的音乐那样可以吸引各个层次的听众，他的音乐几乎只能迷住那些成熟的音乐爱好者，对此作曲家毫无顾忌，因为其永远都将音乐创作作为目标。

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芭蕾舞剧始终占据了一定的比重，无论是其自己创作的还是改编其他作曲家的。《普尔钦奈拉》即

到香港前，循例联系演员邵音音。音音姐回复：我在谢票。原来最近她主演的电影《全力扣杀》正在香港院线热映。谢票，就是主创人员亲自走到放映厅去，待电影放完，全场灯亮一刹那，演员与导演齐起身对观众支持亲表感谢。观众在那一刻的感受是一秒钟前还在银幕上的人突然跟自己面对了，很有意思。而且马上可以和主创讨论观感，没有观众不兴奋的。看到音音姐传来的照片和视频，她与林敏聪、何超仪、郑伊健、梁汉文等一群演员及导演郭子健、音乐总监夏裕介去到香港屯门、元朗、旺角、铜锣湾等各方戏院，每个人的开心都写在脸上。

音音姐参与了《全力扣杀》几乎每场的谢票活动。被网友戏称“谢票天后”。勤力的谢票造势下，票房水涨船高。一周过六百万，十破千万。香港的市场，有这样的成绩可以用“黑马”形容，谢票功不可没。每个观众的口碑是自发的宣传。如果他喜欢这部电影并愿意分享出去，会影响到身边的人。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微信、微博，这样的宣传，能达到传统宣传去不到的角落。

这是从收益角度看谢票这件事。但音音姐又不全是为了票房这么功利。那天听到她和电影公司沟通。对方说到某家戏院稍偏僻，演员去的话怕观众还没演员多，尴尬。音音姐说：“哪怕就一个两个观众也要去。地方这么不好，观众仍然

支持，这种感情更珍贵。”后来去了，观众并不是只有小猫两三只。很多观众还说正是看到朋友传了谢票内容所以来看。音音姐听了很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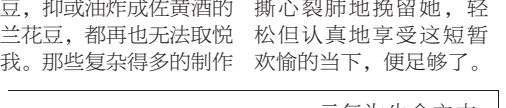
谢了这么多场的票。音音姐自己还没有机会完整看完这部电影。我来香港，特意约了一起去观影。早场，观众却不少，多是年轻人。精彩处全场大笑，音音姐笑得最大声。没人知道黑暗里这最大的笑声就是银幕上的“梅姨”本人发出来的。

后来看完电影，在户外的垃圾筒前抽支烟。画面就像音音姐参演的经典电影《志明与春娇》。没打火机，于是跟一对年轻情侣借。他们是专门来看《全力扣杀》的，买了票等开场，不敢相信居然遇到演员本人。他们还在害羞，音音姐大方地说：“为什么不和我合影呢？”把那男孩逗乐了。女孩笑到开怀。音音姐还说：“你们看完这部，继续支持6月4日上映，我和冯宝宝主演的《妈咪侠》。那是一部讲述母爱的电影，带着妈咪来看噢。”然后转头对我说：“你帮我跟上海的朋友说，5月29日，《妈咪侠》上海上映。请大家多多支持这样的非商业大片。我们做电影的会好感激。有机会也会来上海谢票。”

嗨，真是感慨：有这样尽责宣传的演员，真是电影公司的福气。进一步言之，有这样敬爱演戏、珍惜观众的演员，又何尝不是观众的福气呢？

谢票

甘鹏



又见「台尔蒙」 汤惟杰

俗谚有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世事往往如此。四月下旬的一天，途经华山路的中国音乐学院。和朋友谈过正事，趁着天好，便在校内闲逛起来。近年上戏重新修整了学校中的若干历史建筑，几栋老房子如今颇有看点。正当我细细打量熊佛西楼的外观时，它边上那座红砖小洋房墙上的招牌吸引了我。凑上前，才晃了几眼，便有个眼熟名字跳了出来——“台尔蒙”！哦，这所如今被戏剧学院用作“新实验空间”的小楼，便是当年的“台尔蒙”啊。

几周前，为“夜光杯”写短文《张爱玲与上海电影》（刊4月21日本报A27版），查阅了老电影人陆洁先生的“日记摘存”，在他上世纪40年代的记录中，多次出现这个“台尔蒙”，比如在1945年，陆洁在台尔蒙“试观”多部影片，而1947年4月1日，更有《不了情》在台尔蒙配音”。当时便想，日后有时间要去弄清这“台尔蒙”是个什么所在。没想到，才过了一周不到，竟然让我无意中得之，真乃大快事。

参考标牌上的介绍，回家又查阅了一点资料，大致弄清了上戏这片校园以及这所“台尔蒙”的来历：上世纪初，这片靠近租界西端界的土地，曾被用作“德侨乡村俱乐部”（German Country Club），如今上戏的熊佛西楼，建于1903年，是俱乐部的主楼，而它边上的红砖小楼，是更晚些时候（约1920年代）所造，用作舞厅和电影放映等娱乐用途。1930年代据说曾被法国人收购，而据查李林西报社出版的《上海行号录》1932至1941年的记载，当时这家俱乐部的门牌号——海格路（即现华山路）452号曾登记有一家名为Del Monte Café的餐厅。Del Monte，如今一般读作“德尔蒙特”，也就是当时人所称“台尔蒙”的出处了。

1942年4月，“中联”制片公司成立，将其总管理处设在海格路452号院内。抗战胜利后，这里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接收，“中电”二厂入驻此地，并将“台尔蒙”的房舍改装用做电影录音室，而不少缺乏设备的制片公司常会来此借“台尔蒙”做影片后期；一时间，这里是上海电影人会聚之所，许多片子在此配音、配乐、录歌，一直到1956年上海戏剧学院搬入为止。后来，上戏这个院子的门牌号也从当年的华山路452号变更为630号。

看到Del Monte Café这家餐馆名字，总觉得好生眼熟，猛然想起自己有一篇论文曾提及它。回头一翻，果然如此：多年前在查阅1920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时，发现当年这家餐厅曾因夜间歌舞声响扰邻而被人投诉，巡捕房一个月内8次派出警员查访，并严格记录了它每晚打烊时间，并最终予以警告。这条发现起码说明一点：“台尔蒙”餐厅的开张比《行号录》上记载得要早许多。《警务日报》中这家餐厅正位于徐家汇路（Sicawei Road）452号。有一点需要知道的是，1920年的这条Sicawei Road，并非现今的“徐家汇路”，它在一年后（1921年）更名海格路（Avenue Haig），1943年再次更名为华山路，直到今天。

今天，“台尔蒙”还静静地栖息在一片绿荫的院落中，守护着属于它的故事。

